

交流叙述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王 委 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叙述学关于交流的论述在叙述学诞生之初就有,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情景图示则是一个突破,并得到后来很多人演绎。修辞叙述学对叙述的修辞性交流论述较为充分。在叙述转向和广义叙述学(符号叙述学)背景下,叙述的交流性越来越成为一种核心特性,因此,建构交流叙述学正逢其时。交流叙述学(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以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为基础,以文本内、外“双循环交流”为研究内容搭建交流叙述的研究框架,其研究对象即为所有叙述类型中叙述交流的内在交流与运行机制,同时将这种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历史视野之中。

关键词:交流叙述学;经验视野;梭式循环;双循环交流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1-0126-06

作者简介:王委艳(1977—),男,河南内黄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平顶山学院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叙述学研究。

一、“交流”的叙述学描述与交流叙述学的建构

在提出“交流叙述学”这一学科之前,有必要对叙述学研究关于交流叙述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以期建构交流叙述理论的研究谱系。

影响叙述学诞生的俄国形式主义虽然致力于文学作品的形式研究,但对于文学作品的交流性有着诸多论述。托马舍夫斯基在《主题》(1925 年)一文中指出了文学过程的两个重要时刻:选择主题和设计主题,而这两个重要时刻所围绕的中心问题则是作品的交流性:“主题的选择密切取决于主题在读者中得到的反应。……读者形象即使是抽象的,即使它要求作者尽力使自己成为作品的读者,这种形象也始终出现在作家的意识里。”^[1]而“对技巧的关注是作家和他最亲近的读者习以为常的事。”也就是说,对于主题的选择与设计均以获得最佳的读者交流效果来展开。应当看到,俄国形式主义并没有发

展成为一种交流性的理论,它对于文本形式的关注是其研究核心。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理论家雅各布森在 1956 年 12 月 27 日美国语言学年会上做的《语言学的元语言问题》演讲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交际图示,雅各布森这样解释:“说话者把一段话传送给受话者。想要使交际运行起来,这段话还需要有一个所指的语境,该语境可以为受话者所把握,它或者是语言的,或者是可以语言化的;需要有一套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或者换言之,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完全或者至少是部分共有的代码;最后,还需要有接触,接触是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一条物理通道和心理联系,它使双方能够进入并且保持交际状态。”^[2]雅各布森的语言交际图式揭示了语言的交流的影响因素以及交流的渠道,对于后来的文学交流性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叙事作品作为人类的言语行为,其交流性不言而喻,无论从历

收稿日期:2013-10-24

史传播角度的代际交流还是作为共时性交流,雅各布森的语言交际图示均会得到体现。与雅各布森不同,巴赫金把文学作品看做的一种“对话”,对话双方的交流性来自彼此的充分平等、自由,思想的坦率表达,与此适应的是其复调理论和狂欢化思想,而其核心则是基于平等条件下的对话与交流^[3]。

经典叙述学受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侧重研究叙事作品的话语与结构,文本内部研究是经典叙述学研究的核心。但叙事作品的交流性一直作为一股暗流存在。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不但开篇明确提出叙事作品的多样性,即叙述广泛存在于各种题材、口头、书面等等,以及叙事的普遍性,诸如神话、传说、历史、戏剧、绘画、电影、甚至彩绘玻璃窗、连环画、社会杂闻等等,同时,在“叙述”一节的第一部分,专门对“叙述交际”进行的论述。巴特指出:“叙事作品作为客体也是交际的关键:有一个叙事作品的授者,有一个叙事作品的受者。大家知道,在语言交际中,我和你是绝对互为前提的。同样,没有叙述者和没有听众(或读者)也就不可能有叙事作品。”巴特同时指出了叙事作品在交流研究方面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探究叙述者的动机,也不在于探究叙述对读者产生的影响,而在于描写叙事作品本身过程中叙述者和读者得以获取意义的代码。”^[4]当我们历经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之后,进入到叙述转向及广义叙述学阶段时,重新回顾巴特在半个世纪之前的论述,不得不说,关于交流叙述的研究依然进展缓慢。

普林斯作为叙述学从经典走向后经典的见证者,在其著作《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一书中扩展了叙述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在本书第四章“阅读叙事”中,探讨了叙事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他在对阅读的定义中指出,阅读以“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为前提”,阅读一部文本就是提出“关于文本的问题并在文本基础上回答它们”^[5]。在本书中,普林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概念,对于交流叙述学的研究极具启发价值,比如在第一章“叙述”中的“叙述者”中提出“‘我’信号”;在“受述者”中提出“‘你’信号”;在第四章“阅读叙事”中提出“最大阅读、最小阅读”、“元叙事信号”等等,这些概念对于交流叙述中交流因子的辨识与交流语言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后经典叙述学的产生并非是简单的时间概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叙述学诞生开始,一些突破经典叙述学研究范式的理论思想就已经孕育其中,

如上引巴特的理论思想及其对电影、摄影、时装等等的研究,便已经突破经典叙述学的研究范围和范式,而在符号学意义上具有某种普遍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修辞叙述学研究越来越注意到了叙述的交流特性,修辞的单向意向性正被交流的双向影响所取代。在交流叙述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查特曼著名的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查特曼的图示根本上是修辞性的,单向性明显,读者(包括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处于交流的末端,作者(真实作者和隐合作者)具有交流的先天优势,其权威性决定了交流只能单向流向读者,交流的单向性很难再从读者回溯到作者。因此,这里的交流只是一种修辞行为。詹姆斯·费伦注意到了查特曼交流图示的单渠道缺陷,他把人物引入叙事交流之中,从而获得双渠道交流:1. 作者——叙述者——读者;2. 作者——人物——读者。费伦指出,这两种渠道将会相互作用,这样,交流总量要比查特曼的单渠道大得多。修辞叙事学研究从布斯开始,经由查特曼、卡恩斯、费伦发展,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关注文学叙事作品之外的叙述作品研究,比如电影(查特曼),关注语境、规约和言语行为(卡恩斯),关注作者、隐合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之间循环往复的关系(费伦)。由费伦的“双渠道”交流可以看出,每种渠道依然是一种单向性流动,渠道与方向是两个不同概念,双渠道并非意味着交流可以从读者向作者回溯,影响基本是一种单向性的,依然难以揭示叙述经验的积累过程以及这些经验对于叙事交流的意义,同时,也很难将这种单向性(或者双渠道)放置于叙述的历史层面,揭示叙述交流对于叙述作品由简单走向复杂的动态历史过程。

因此,要建构交流叙述理论,必须克服上述的“影响的焦虑”,摆脱其修辞性影响,从理论上建构广义叙述学背景下的交流叙述学的研究框架。Didier Coste 在其著作《作为交流的叙述》中指出:“叙述学欲在行动上获取交流,但它仅能够在如下被报道的每一阶段获取交流,即前文本、文本、解释、同文本、……上下文、注释、评论、答案和其审问等等。”^[6]也就是说,叙述交流需要有某种交流性因子,这些因子会在叙述交流的每一个阶段起作用。Didier Coste 同时指出:“本书不是关于叙述的一般性,而是关于叙述性交流的一般性。”“叙述不具备实质性,单词‘叙述’基本上是一个形容词,而不具有实质性。”可见,Coste 的研究重点是“叙述性”交流,而非“交流性”叙述。笔者认为建构交流叙述学学科以适应当

今叙述转向与叙述扩容。交流叙述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叙事类型中参与者(作者、叙述者、受述者、接受者等)如何以叙事文本为中心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即他们之间的内在交流机制。交流叙述学关注叙事交流中施受双方的经验以及经验如何影响各自的交流行为。任何交流必须以经验为基础,无论这些经验建立的时空、形式、内容等是什么,都会对交流构成影响。不存在没有经验参与的交流,即使动物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建构交流叙述学的理论框架首先要从经验的动态运行逻辑开始。

二、经验交流的“梭式循环”

任何叙述类型都有经验继承特征,正因为叙述经验的继承性才有可能使不同叙述类型由简单走向复杂,由粗糙走向精致。针对具有继承性的叙事文本,文本各种要素的传承逻辑如何?这些要素如何参与叙述交流的、其作用如何?这些交流叙述经验如何进入新的叙事文本并参与新的循环?等等,这些问题均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任何叙事作品都存在一种经验传承链条,(这里,经验指的是人的感性与理性获得的、已经内化并进入传承链条的知识),这种传承链条中的核心就是经验视野,经验视野的传承遵循着一种“梭式循环”。

任何叙事文本的作者都会经历经验学习过程,即都会经历自己的接受者阶段,当这种携带各种经验的“作者式接受者”进入叙事文本的接受状态,并在接受过程中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改进、修正时,当这类接受者进入创作时,他会把他的这些经验以各种方式表达在他所创作的文本之中,从而完成经验的传承。也就是说,作者与接受者并没有一条“鸿沟式”界限,在叙述交流中,二者会在历史意义上相互转化。“梭式循环”并非是一种圆形回溯,而是携带交流影响因子的动力线在折返回作者过程中时空已经发生改变,动力线所携带的影响因子会以不同的身份和姿态进入新的文本,从而完成一种动态循环,经验视野的传承就会在历史的累积中完成。梭式循环沿着时空轴进行循环运动,形成文本发展的内在逻辑动力,其中的时空是变动的,因此,梭式循环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有时,循环的某些环节时空会减缩,尤其在当今网络、广告、影视、新闻等叙事类型中,时空减缩明显,经验传承变得快速。

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

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7]姚斯指出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有两种内含。一是美学内含:“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包括同已经阅读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比较中就包含着对作品审美价值的一种检验。”一是历史蕴涵:“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就是说,经验视野的传承、审美与历史蕴涵的检验与丰富均在读者接受中完成。需要指出的是,经验视野在通过读者进行传递过程中如果不进入新的文本,那么很难完成经验视野的传承任务。同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对文本生产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如果单从读者角度来建构文学史,为文学作品的连续性找到解决办法,则和单纯从作者与作品角度写文学史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同样会坠入另一种偏见之中。

解释学从理解的角度来阐释经验的传承。

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本文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作出这样一种预先的筹划——这当然不断地根据继续进入意义而出现的東西被修改——就是对这里存在的東西的理解。

对前筹划(Vorentwurf)的每一次修正足能够预先作出一种新的意义筹划;在意义的统一体被明确地确定之前,各种相互竞争的筹划可以彼此同时出现;解释开始于前把握(Vor-begriffen),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了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见解(Vor-Meinungen)的干扰。^[8]

应当指出,此处的“前筹划”、“前见解”本身同样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同一文本不同读者会有不同的前见解,而且这些“前见解”也是一个历史累积过程,这种“累积”不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是蕴含于历代的文本之中。解释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视野融合”,也存在着一种历史累积过程,“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产生的‘视野融合’是因为作品中有某种可以与历史衔接的‘融合点’,这些融合点并不是孤立的偶然

现象,而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受历史(文学作品)影响而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或人为投射,是‘经验视野’在作品中‘积累’的有力证据。由此可见,孤立的研究读者阐释所产生的‘视野融合’现象而不考虑作者对造成这种‘视野融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片面性”^[9]。

由此,作者与读者的界限在历史维度变得模糊不清,即二者在经验交流的链条中可以相互转化,经验视野就是在这种转化过程中获得逻辑动力。叙事作品就是在这种经验交流中得到传承、创新与发展。从民间故事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模式,到现代小说的“多少年之后……”模式,我们看到叙述在培养作者的同时也培养了读者,二者在这种“梭式循环”中承受相同的继承性压力与创新性动力,经验视野围绕时空轴线不断地做着梭式往返运动。

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可以在叙述转向和广义叙述学背景下得到检验。赵毅衡先生从符号学角度对叙述下了一个最简定义:“1. 有人物参与的变化,即情节,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2. 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的向度。”^[10]可以看出,叙述文本的建构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即首先必须有作者把有人物参与的情景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同时此符号组合必须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的向度,二者缺一不可。当我们以此定义来考查叙述文本发现时,叙述作品类型的容量空前巨大,叙述学研究面临巨大挑战。但与此同时,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在扩容后的叙述类型中变得非常明显。比如广告叙述,一种叙述经验在过去也许需要成百上千年时间,而广告叙述经验则只需几天甚至几小时完成,如明星代言、伴随文本运用,等等。再如网络活态叙述,如犀利哥事件,很多人参与其中而难辨作者与接受者,但其伴随文本会很快地被拥有不同目的的人所利用,如广告商。网络叙述所潜藏的能量很快便形成经验视野而参与到梭式循环链条当中。网络炒作便可以看作是经验视野梭式循环模式的活态证明材料。如果说交流性在文学叙事作品中还处于潜藏状态的话,那么在其他叙事类型如新闻、庭辩、教育、广告、影视、体育中,它则成为一种核心特性。

三、交流叙述学的“双循环交流图式”

如上所述,查特曼的图示基本是一种单向的修辞性交流,交流双方并不对等。针对查特曼的叙事—交流图示,里蒙—凯南提出了自己的两点不同看法,其一是对于隐含作者,“如果要始终坚持把隐含

作者和真实作者、叙述者区别开,就必须把隐含作者的概念非人格化,最好是把隐含作者看做一整套隐含于作品中的规范,而不是讲话人或声音(即主体)。照此推论,隐含作者不可能是叙述交际场合的真正参与者”。其二是“把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作为必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作为可以取舍的成分,纳入叙述交流过程”^[11]。这里,里蒙—凯南并没有改变查特曼交流图示的单向性。如上所述,作者与接受者并没有“鸿沟式”界限,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此其一;其二,接受者可以建构文本,甚至可以建构作者、建构人物、甚至建构作品的意识形态。因此,交流的单向性无法解释这些问题。谭君强先生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了叙述交流的“双向性”,并指出有两种交流过程:“叙述本文范围之外的交流”和“叙述本文范围之内的交流。”^[12]但上述理论家们关于叙述交流的理论表述在渠道、方向方面论述依然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处理:用以支撑交流行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交流各层次的媒介又是什么?仅仅有渠道、方向还远远不够。正如费伦所说:“文学交流最终是关于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13]经验视野就是支撑交流行为的核心要素,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可以为叙事文本交流的各层次提供交流的内在动力系统。经验视野提示我们,交流各方的交流行为在经验视野背景下并不自由,因为经验可以提升为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可以影响交流方式、交流内容、交流效果等等。

以“梭式循环”为基础,叙事文本存在两种交流循环图式,即文本内循环图式和文本外循环图式,这种双循环交流图式构成叙事文本交流层次,但这两种循环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在叙述交流过程中会出现“跨层”交流现象,同时,各循环内部各个交流层次之间也会有“跨层”现象,从而使叙述交流呈现出复杂状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交流是一种经验交换,是交流双方在媒介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并进而转化为行为方式的过程。

其一,文本内循环包括两种循环模式:1. 人物——事件——人物;2. 叙述者——故事——受述者。两种循环模式中的交流双方并没有方向性指示,因为两种模式的交流双方都可能成为主导方而对另一方产生影响,二者是相互的,交流是可以回溯的,是一个环形图示,即“人物—事件—人物”和“叙述者—故事—受述者—叙述者”,而且两种模式可以实现跨层交流,即,叙述者和受述者均可以成为人物,反之亦然。

人物——事件——人物。人物之间的交流基本是以事件为基础,这里,人物并非只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他有可能是一个行为群体,确切地讲应该是一个承担叙事人物功能的实体。在广义叙述学背景下,某些叙事并不以单个具有人格的人出现,而是一个承担人物功能的存在物,比如体育叙述,某一团队即可承担人物功能,但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人物之间以事件为媒介,事件不具备整体故事功能,而是故事的组成部分。人物在以事件为媒介进行交流过程中,经验视野有一个累积过程和行为化过程,事件会通过经验过滤而形成具有人物性格、行为方式、心理内含、道德伦理与意识形态内含的“交流场”,而经验遵循“梭式循环”的交流性链条。由此可见,以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为基础,以事件为媒介的人物交流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研究,而是更具有内涵意义。而且,人物交流有时会出现跨层现象,不但向文本内的其他交流层次跨层,而且还可能出现向文本外的交流层次跨层。

叙述者——故事——受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通过故事进行交流,故事是一个整体概念,是事件的集合,但故事不是文本的全部,它不代替“叙述文本”。在广义叙述学背景下,许多叙述类型的这一交流层次并非是一种虚构,而是真实的或拟真实的,比如教育叙述、医疗叙述、新闻叙述、口述历史、广告叙述、庭审叙述等等。但无论虚构还是真实,均以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为基础,交流双方的经验背景为其行为方式提供支持。这一层次的叙述者、甚至受述者会出现跨层,比如二者均有可能成为故事人物;同时也可能跨出文本参与文本外的交流循环。

其二,文本外循环,也包括两种循环模式:1. 作者——叙述文本——接受者;2. 叙述作者集团——叙述载体——接受者集团。第一种模式是具体的,第二种模式是站在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待的。同样,这里的每种交流模式中并没有箭头式的方向性,因为每种模式同样可以回溯,交流永远是一种相互的过程,主动与否在历史意义上很难判定。同时,两种交流模式之间也会出现跨层现象。因为交流叙述学在交流双方相互作用过程中,文化因素会参与其中,比如体裁的约定性、文化规约、道德伦理规约、意识形态等等因素会参与到叙述交流之中,形成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交流叙述图景。

作者——叙述文本——接受者。任何叙述文本均会出现“镜像”问题,区别只是镜像层次多少的问题。对于文学叙事而言,上述文本内交流均会成为文本

外交流的镜像,而对于叙述研究者来说,文本内、外交流层次就会成为他们的对象。一种交流层次会在另一更大的交流层次那里找到自己的副本。交流叙述学是在叙述的广义背景下展开的研究,因此,存在于作者——文本——接受者之间的叙述交流具有超越虚构与真实的意义。同时,这一交流层次中,作者与接受者有时会模糊不清,所谓“谁说”、“谁听”问题会变成众声喧哗,而且,这一层次的交流双方有时会公然跨进文本内的交流,使交流叙述呈现更为复杂局面,比如网络叙述。

叙述作者集团——叙述载体——接受者集团。当我们把交流叙述扩展为一种历史视野,会发现经验视野的传承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虽然在某些叙述类型中这一过程会变得很短暂,但这一过程不会消失。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经验累积、经验创造过程,这一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事后”结果。叙述作品的历史也是一种经验累积、经验创造的历史,即使同一作者在交流中获取的经验,也需要在下一部作品中运用,而不可能改变已经经验过的事实。因此,在历史意义上,叙述文本的作者是一个集团,它与接受者集团之间会有“身份翻转”,即这一阶段的接受者会在下一个交流阶段成为作者,反之亦然。同时,参与交流叙述的作者集团还可能包括参与叙述文本形成的各种因素,如出版商、版式设计者、甚至身兼接受者角色的评论家等等。而接受者集团也可能包括评论家、教育工作者等等。这里,起推动作用的是经验交流的“梭式循环”,时空会在以“叙述载体”为中心的交流中成为历史。在这种意义上,任何叙述交流都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经验的。这种处于集团状态的宽泛的交流叙述会在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模式下获取交流的行为姿态,流派的形成、创作集团、地域创作群体的出现等等,便在叙述交流经验的“梭式循环”意义上获得解释,甚至可以扩展为整个文化模式。

上述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双循环交流图式遵循“梭式循环”的经验交流传承原则,从而形成交流叙述学基本的学理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有许多需要探索的理论问题,比如交流过程与交流经验的层次、不同体裁的叙述交流原则,叙述文本的意义交流方式,叙述层次与叙述交流的影响因素、跨层交流等等。

四、交流叙述学的学科前景

综上所述,交流叙述学以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为基础,以探索文本内、外的“双循环交流”,以及

各交流层次间的跨层交流、交流叙述的文化内涵、交流机制等等为内容,搭建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交流叙述研究框架。交流叙述学的提出背景是当今叙述学发展的实际,即叙述转向和广义叙述学的形成。叙述交流作为人类交流行为的核心模式之一并没有得到叙述学研究的充分论述,尤其是当前叙述普遍化的现实语境,新闻、网络、游戏、医疗、教育、庭辩、体育等等使交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叙述行为。参考文献:

- [1]鲍·托马舍夫斯基.主题[G]//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34.
- [2]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M].钱军,王力,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52—53.
-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4]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G]//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8.
- [5]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02—103.
- [6]Didier Coste. Narrative as Communica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6.
- [7]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 [8]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册[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43.
- [9]王委艳.作者的“读者”维度与文本动力学[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 [1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
- [11]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8—159.
- [12]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7.
- [13]詹姆斯·费伦.修辞、伦理即叙述交流:抑或从故事和话语到作者、资源与读者[G]//叙事学研究:理论、阐释、跨媒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0.

索交流叙述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可以为诸多叙述的交流性提供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某一学科的叙述交流特性可以作为分支来研究,探索各种叙述类型中的交流性的独特性,如新闻交流叙述学、网络交流叙述学、游戏交流叙述学等等。因此,交流叙述学可以发展为更多体裁的交流叙述学分支。在这一层意义上,交流叙述学的提出仅仅是交流叙述研究的一个起点。

The basic problem of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WANG Wei-y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Communication was discussed in nar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irth time of Narratology, but has not been fully studied. Chatman's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scenario diagram is a breakthrough, and then a lot of people make their own deductions. Rhetorical Narratolog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hetor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arrative turn and Generalized Narratology (Symbolic Narratology), communication increasingly become a core characteristic, therefore, it is the time to put forward the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takes Experience Horizon as the basis, and the Dual cycle communication as its content of research to build a research framework. The objects of its' research are th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in all the types of narrative texts with the broa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iew.

Key words: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Experience Horizon; Shuttle Loop; Dual Cycle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海 林]